

目 录

目 录	(I—II)
前 言	(1—4)
(一) 大事记 (时代背景)	(4—11)
纪事一 中央观象台从成立到撤销	(11—13)
纪事二 南北两个测量系统的蝉联	(13—16)
纪事三 青岛观象台几度易手	(16—26)
纪事四 《观象丛报》的出版和在国际上进行交换	(26—32)
纪事五 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详志	(32—56)
(1) 前身之一——时政委员会	(33—36)
(2) 前身之二——观象台筹备委员会天文组	(37—41)
(3) 选址——筑路——建台	(41—44)
(4) 抗战播迁	(44—50)
(5) 旅昆八载	(50—54)
(6) 返回南京	(55—56)
纪事六 天文工作队伍的来源	(56—69)
纪事七 北京古观象台及古代天文仪器之管理	(69—80)
(1) 教育部接收钦天监三所房屋	(70—72)
(2) 古代仪器开放参观	(72)
(3) 国立天文陈列馆建置撤销始末	(73—75)
(4) 部份古代仪器迁运南京	(75—80)
纪事八 凤凰山天文台志略	(80—83)

(二) 历法	(83—108)
(1) 改进历数和算法	(83—96)
(2) 历法和上层建筑的关系	(96—108)
(三) 实用天文	(108—123)
(1) 测量经纬度	(109—118)
(2) 测时及报时	(118—122)
附 城市报时	(122—123)
(四) 历法实用天文外其他各分支	(123—133)
(1) 天体力学	(123—125)
(2) 天体物理学	(125—131)
(3) 相对论	(131)
(4) 年代学	(131—133)
(五) 杂记	(133—154)
(1) 应在本书之外补充的史料	(133—136)
(2) 可供参考的文献	(136—138)
(3) 反动政府怎样摧残科学	(138—142)
(4) 旧中国天文机构的模式和名称	(142—148)
(5) 大学院成立对中央研究院的影响	(148—150)
(6) 天文研究所业务人员的精神状态	(150—154)
结 语	(154—158)
附 大事年表	(159—162)
跋	(163—169)

前 言

本书是回忆录性质，但不是对某一事件的专纪，而是对近代旧中国天文事业全貌勾画出一幅轮廓。

首先谈撰写本书的旨趣。近二百年中国天文事业史明显地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辛亥革命向上逆溯到清乾隆年代后期，约数是一百三十年，在这段漫长时间内，基本上呈现停滞不前的局面。第三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到笔者开始写本书的1979年，恰满三十年，在这段较短时间内，是蓬勃发展的局面。本书所称“近代”，指的是介于第一、第三两时期中间的过渡年代，就是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一段时限，实数为三十八年，粗略地酌取整数，说成约四十年比较便当。这四十年是中国古天文学跃进到现在天文学的过渡年代。凡称过渡，就含有起桥梁作用的意味。本书旨在介绍这些具体桥梁。在这个过渡年代里，曾经建立少数和清代钦天监面目迥不相同的天文机构。曾经从国外进口少量和清朝光绪年间新制的地平经纬仪迥不相同的新式仪器。曾经培养一批相当大专或中专的天文工作者。在这些天文机构中，曾经容纳少量人员做了一点天文工作，尽管工作做得数量太少，质量又低，但毕竟起着一点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单指出下列两事便可以说明：第一，从发展基础方面说。建国初期，中国科学院把主要力量投放在筹建新所和发展一部份旧所，天文不在其列。记得1953年冬，紫金山天文台孙克定副台长曾在全台工作计划会议上传达院方指示：“天文机构在近三五年内不作大发展，只着重在练兵”。五十年代前期天

文机构都是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旧摊子上改造过来的，房屋、仪器尽可能修旧利废，工作人员多数是留用的旧人员，不论是中国自有的天文台，还是从帝国主义手中接收过来的徐家汇、佘山两天文台都是如此。第二，从培养人才方面说。解放前中国天文工作者人数少得可怜。虽然中山、齐鲁两大学数天系设立了二十余年，但其中天文专业每年只有毕业生几个人，甚至有时只有一个人。而且毕业后多已改行，不知去向。1950年由紫金山天文台接管徐家汇、佘山两台，除留用全部中国籍旧人员外，还经过努力查访，访到两校后期毕业的几位，召来归队，充实三台。为此，加速培养参加新中国天文事业建设的人才，便成为当务之急。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合并中山、齐鲁两校数天系，迁设南京大学内，成立天文系，扩大招生名额。当时南大的天文系教师基本上仍是中山、齐鲁两校原有教师，另有少量课程由紫金山天文台高级人员兼课。这些专职的、兼课的教师基本上是旧中国的旧人员。中山、齐鲁两校天文仪器数量不多，运到南京后又因基建未能早日上马，无法安装，学生实习到紫金山、徐家汇、佘山三个旧天文台进行。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吸收旧社会的测绘界人员为骨干，建立起测绘学校。这个燎原星火，为后来测绘事业飞速发展奠定基础。其中大地测量（这里主要指天文测量）人才的培养，也是由旧人员为教师，把实用天文知识传授给在新中国成长的青年，同样起着传帮带的作用。由此可见，不论从发展基础方面看，还是从培养人才方面看，这四十年天文遗产，即人员和设备的遗产，都起着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尽管建国三十年来，天文界新生力量蔚然兴起，这一批后起之秀的造诣有不少超过他（她）们的老师，但旧人员的启蒙作用不可埋没。尽管建国三十年来，除了几个旧天文台

设备更新，规模扩大外，还建立起几个新天文台；在南大天文系之外，还成立几个新天文系或天文专业；但旧设备作为练兵场所的作用也不可埋没。测绘界培养实用天文人才的启蒙作用，练兵场所作用也同此例。中国有句谚语：“过河不要拆桥”，既然起着过渡作用，现在虽然已经过了河，对这座旧桥的史迹主要指一些已经关、停、并、转的天文机构的史迹应该用文字保留下来，供汲取经验教训，提高预见性，减少盲目性之用，这是撰写本书的第一旨趣。

其次，目前中国天文工作队伍，包括天文科研、天文科普、天文教学、天文测量、天文学史以及天文仪器制造各方面，合计已有数千人之多。这批人中绝大多数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的，由于工作岗位的关系，他们有时候需要接待新闻记者、期刊作家采访，回答问题。问题中有的需要穷源溯流，追叙往事。他们对这类往事本身就知道的不多，回答已不十分准确。再加上记者们任意取舍，渲染附会，登载在报纸期刊上面，往往出现时序颠倒，张冠李戴，因果乱套以及一切不符合当年时代背景的情况，使当年身历其境者读后感觉啼笑皆非。为此，需有一本如实反映这四十年天文事迹的信史问世，以免以讹传讹发展到不可究诘。这是撰写本书的第二旨趣。

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尤其是第二原因，在我理想中应该有一本《中国近代天文事业史》问世。这是我的愿望，但我本人却不胜任编写，一则由于我写作技能低，心余力绌；二则由于我远居边疆，查阅资料困难。但我愿意做这项工作的开路先锋，先替这本书勾画出一幅粗线条轮廓，提供线索。发表之后，估计可能引起连锁反应，有些知情人可能写出《订正》，纠正我所写的错误；有些知情人可能引起联想，回忆往事，写出《补充》补充我所写事迹的详情。最后由有关部门组织力量，以本书为蓝本，汇集群众提供的《订正与

补充》材料，并参考遗留下来的这四十年中的文献，旁征博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写出一本正式的《中国近代天文事业史》。

最后谈一下本书的布局。除首尾《前言》和《结语》外，中间共分五章。（二）、（三）、（四）三章是业务史，可供编写《中国天文学史》最末一章近代部份时选择采用。第（五）章标题为《杂记》，容纳一些线索资料书目和轶闻遗事。第（一）章是天文事业史的贯穿线（主要是天文机构史），侧重时代背景，反映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近代天文事业从开始诞生就先天不足，发育不全，在四十年国家严重的内忧外患中勉强挣扎，苟延残喘的事迹。第（一）章按事件发生先后叙述，以统驭后面四章，是以经系纬。同属第（一）章，又以《大事记》为经，以八篇《纪事》为纬；而每一篇《纪事》依然按时序先后叙述，也是以经系纬。为了避免重复，文中随时加括弧添注“详见《纪事×》”“参阅×章×节”，做到经纬交织，纵横贯通。力求对每一事件的产生和归宿都叙述得脉络分明，因果准确，藉以矫正近年报纸期刊所登载的天文事迹不够翔实之流弊。

（一）大事记（时代背景）

公历1911年10月10日，旧民主主义革命军起义于武昌。不久，长江以南各省和华北数省纷纷响应，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同年十二月，各独立省份推派代表到南京集会，组成临时政府，采用共和制，建立中华民国，推举孙文（逸仙、中山）为总统。孙总统于公历1912年1月1日晚间抵达南京就职。当晚发布《改用阳历令》。不久，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孙总统辞职，让位给袁世凯，南京政府迁设北京。已经更换了朝代，并已更换了历法的民国政府首先要做的—

件事，便是编制并颁行新历书，这个任务交由刚从南京迁来的教育部负责主持。教育部派员接管清政府的钦天监，并裁撤了这个旧机构，另在这个旧机构的“外署”之一，即泡子河观象台这座廨署建立一个新机构，定新机构名称为“中央观象台”。台内组织预定分设四个业务科，先成立历数一科，以应付赶编历书这个紧急任务（详见后文《纪事一》和第（二）章全章）。

1912年民国政府接管清政府的军谘府这个旧机构，改组为“参谋本部”。参谋本部接管原军谘府所辖陆军测量总局和京师陆军测绘学堂，继续办理原有业务。测量总局名称不改，学堂名称改为陆军测量学校（详见《纪事二》和第（三）章）。局、校都设有三角科，分别开展天文业务和天文教学工作。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日本参战，加入协约国一方，出兵攻占了德国在中国青岛的租界地，接管德国设在青岛的所有机构，包括德国在1898年创建的青岛观象台，改为青岛测候所（详见《纪事三》）。

1915年中央观象台用“中国天文学会”名义（当时学会尚未正式成立）出版《观象丛报》，月出一册，和外国天文机构（附气象、地磁、地震机构）进行交换（详见《纪事四》）。

1916年私立南通军山气象台成立，兼搞天文工作。

1917年中国也对德国宣战。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交战双方在法国巴黎凡尔塞宫签订和约。由于操纵和会的美、英、法三国偏袒日本，竟决定把德国原在中国青岛的租界地和在山东省境内胶济铁路沿线的权益交给日本继承，写入和约。中国出席和会代表力争无效。消息传到国内，引起五四运动。中国代表在群众压力下拒签和约。这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为后来中国收回青岛（包

括青岛观象台)写下伏笔(详见《纪事三》)。

1921年德国政府根据凡尔塞和约另一条,把1900年从中国掠夺去的古代天文仪器交还中国运到北京。(德国掠夺中国古代天文仪器和交还始末,详见常福元著《天文仪器志略》和北京天文馆翻译的R.Schwarz所著《德帝国主义对北京古观象台仪器的掠夺和归还》未刊稿)。

1922年冬中国天文学会正式成立。

1921年冬到1922年春,美国邀请与远东有关系的八个国家连同美国共九个国家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召开这个会议的背景是,为了解决由于中国拒签和约构成的“鲁案悬案”,并且美、英等帝国主义不情愿让日本独吞中国,在会议中对日本施加压力,要求日本把它从德国手中掠夺去的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一切权益交还中国。日本勉强接受下来。从1923年开始,中国陆续接收青岛行政、企业、事业各单位。1924年2月接收青岛测候所,成立一个全部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的新机构,只留用旧工友两名(也是中国人)。这个新机构定名为“胶澳商埠观象台”(详见《纪事三》)。

1926年7月,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以北洋军阀政府为革命对象,从广州出师北伐,同年冬季占领武汉。1927年春,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同时国民革命军东路和中路部队也继续打下上海、南京。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叛变,脱离武汉国民政府,在南京僭立另一个“国民政府”。原在广州的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相当教育部)的大部份委员和职员先已迁到武汉,尚留少数委员和职员留守广州,这时候这少数人从广州来到上海,在南京的“国民政府”下另成立一个教育行政委员会,会址暂设在上海,并增补少数知名人士,以蔡元培为主委。南京的“国民政府”对武汉的国民

政府和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同视为打倒对象，它俨然以当时三个政府中的正统政府自居，成立不久，便在教育行政委员会内设立一个“时政委员会”，担任编制历书工作，它以颁发历书作为统治权的象征（详见《纪事五》和第（二）章第（2）节）。

1927年7月，武汉国民政府首领汪兆铭（精卫）也叛变革命，不久，这个政府瓦解消灭，宁汉合流，改组南京的国民政府。改组之前，由大学阀李煜瀛向蔡元培建议，模仿法国大学区制，每省设立一个中山大学，除担任培养人才任务外，还兼管全省教育行政，代替教育厅。在中央设立大学院，除担任科研任务外，兼管全国教育行政。蔡元培采纳他的建议，呈得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批准，撤销了教育行政委员会，改组为“大学院”。同时撤销了粤、鄂、浙、苏四省教育厅，在广州、武汉、杭州、南京四所原有的大学基础上分别改组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中山大学，兼管各该省教育行政。大学院兼管全国教育行政，内部组织分为三个部门：1. 中央研究院；2. 教育行政处；3. 秘书处。中央研究院内部预定设立若干个研究所，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一个观象台。观象台先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预定将来分设天文、气象、地磁、地震、……等若干组，先成立天文、气象两组。原有的教育行政委员会所属时政委员会被编入观象台筹备委员会内天文组。1928年春，中央研究院撤销了观象台筹备委员会，划分为天文研究所和气象研究所两个机构。大学区制施行约一年，遭到各方面反对。国民党开某次中全会，接受经亨颐委员建议，废除了这个制度，除设在广州的那个大学仍称中山大学（删去“第一”二字）外，其他第二、第三、第四三个大学分别改名为武汉、浙江、中央大学，都交出兼管全省教育行政职权，恢复这四省的教育厅。中央也是如此，改组大学院为教育部，

把原中央研究院划分出去独立，直辖于国民政府，正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从此天文研究所的全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由中国科学院接管后才改名为“紫金山天文台”（详见《纪事五》）。

大约在1927年冬或1928年春，南京政府也设立起参谋本部。参谋本部接管原隶属北洋军阀政府的江苏省陆军测量局，改组为陆地测量总局，后来也开办起中央陆地测量学校。局和校都设有三角科，分别开展天文业务和实用天文教学工作。（详见《纪事二》和第（三）章）。

1926年设立在广州的国立中山大学开办数学天文系，同时筹建天文台。1929年六月，天文台建成。在1929这一年之前或后，南京教育部命令各国教会在中国境内所设私立大学向教育部立案，遵守中国学制和一切教育法令。这时候设在济南的私立齐鲁大学便向教育部办立案手续，校内原设有天算系。按齐鲁大学设立天算系的年代实际比这一年早得多，当时还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年代，确切年份我不知道，现在为了叙述天文教育这一方面的便利，和中山大学写在一起。三十年代以前，中国对科学名词的译名存在分歧，以“数学”这个名词论，有一派人主张译成数学，另一派人主张继承历史传统，译成“算学”，两派争论多年，直到三十年代初，才由旧中国数学会讨论决定，经国立编译馆公布，统一使用“数学”这个译名。中山、齐鲁两校随即改用“数学天文系”作为系名。

1928年4月，南京政府的所谓“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五月初打下济南。因日本军队向中国军队挑衅，造成五三惨案，日本派兵攻占了济南、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后来“国民革命军”让开胶济线，绕道渡过黄河，打进北京，北洋军阀政府灭亡。南京政府改

北京地名为“北平”。命令南京各部分别派员前往北平接收和它们相当的原北洋军阀政府所属中央各部包括各该部的附属机构。中央观象台隶属北京的教育部，而南京的教育部下面没有和它相当的机构，另由国民政府命令国立中央研究院转令所属天文、气象两研究所派员会同接收。天文所由当时的代理所长高平子亲自出马，气象所派职员黄厦千为接收员，二人结伴北上。高黄两人到了北平，秉承上级意旨，撤销了中央观象台，在原台址建立两个新机构，一个名“国立天文陈列馆”，另一个名“北平气象测候所”，分别隶属南京的天文、气象两研究所（详见《纪事七》）。

1929年上半年，南京的外交部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日本军队撤出济南和青岛以及胶济铁路沿线各地。日军撤退实现后，南京政府和平接收原济南、青岛两地旧地方政府。改“胶澳商埠”地区名称为“青岛市”，改“胶澳商埠局”机构名称为“青岛市政府”，改“胶澳商埠观象台”台名为“青岛市观象台”（参阅《纪事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响起抗日战争第一枪，从此进入全国抗战年代。青岛沦陷后，青岛市观象台被日本人占据，中国人员全部撤出（参阅《纪事三》）。设在南京的天文研究所撤退到昆明，在昆明凤凰山建筑临时所址（详见《纪事五》）。设在南京的陆地测量总局撤退到贵阳，它所辖的陆地测量学校撤退到贵州镇宁县，抗战后期，这两个单位一律转移到重庆（参阅《纪事二》）。设在广州的国立中山大学数天系随学校撤退到云南省澄江县。大约在1941年（？）又随学校从澄江迁到广东的坪石。不久，日本军队为了打通粤汉铁路，从广州大举北犯，坪石危在旦夕，又随学校仓皇撤退到广东连县。几度搬迁，历尽颠沛流离之苦。（邹仪新曾写过一篇

纪事，详述艰苦情状，登在《宇宙》某期，可参看）。齐鲁大学在抗战期间内迁成都，并入华西大学。数天系无形停办。设在北平的国立天文陈列馆于北平沦陷后撤销（参阅《纪事七》）。

1945年9月，日本正式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沦陷国土陆续光复，抗战初期内迁各单位纷纷迁回原地。天文研究所迁回南京（详见《纪事五》）。陆地测量总局迁回南京，陆地测量学校迁到苏州（详见《纪事二》）。国立中山大学数天系和它所属的天文台迁回广州。青岛光复后，青岛观象台的日本人被遣返回国，观象台第二次由中国收回（详见《纪事三》）。这里特别要提到的一件事，便是天文研究所在迁回南京之前，对昆明凤凰山临时所址的处理问题。说是临时所址，实际是永久性建筑，而且是当时昆明第一流建筑，弃掷可惜。经过一年的酝酿，最后得到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支持，在这里设立一个新机构，定名为“凤凰山天文台”，作为天文所和云南大学双方共同管辖的分支机构（详见《纪事八》）。南通军山气象台于抗战初期被炸毁，胜利后未重建。

解放战争开始后，大陆国土由北而南先后解放。青岛解放后，青岛观象台由人民海军接管。1956年海军把天文部份移交给中国科学院接管（详见《纪事三》）。1949年4月南京解放，天文研究所由南京军管会接管。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设立中国科学院，天文研究所由中国科学院接管。接管后，把机构名称改为“紫金山天文台”（参阅《纪事五》）。南京的陆地测量机构和学校先期迁往广州，后来又迁往台湾。测量局内以刘述文为首的天文工作者骨干多数留在大陆，南京解放后，这一批人被罗致到沈阳，成为培养新中国测绘人才的种子。1949年秋，广州解放，中山大学包括数天系的天文台先由当地军管会接管，后来由中央高教部

接管。(1952年院系调整,高教部把中山、齐鲁两校数天系合并,迁设到南京大学内,成立南大天文系,这是后话)。云南省解放最晚,是大陆上仅早于西藏的解放区。先是于1949年12月9日由当时的云南当局卢汉起义,成立一个过渡政府,历时约三个月。1950年2月底解放大军进驻昆明,3月初成立军管会,3月下旬军代表接管云南大学,4月初,由云大军代表接收了凤凰山天文台成为云南大学天文台。这个“云南大学天文台”于1950年秋恢复隶属紫金山天文台和云南大学共同管理,机构名称改称“昆明天文工作站”(详见《纪事八》)。

解放前中国近代天文事业的轮廓和产生这些事迹的时代背景大体如上,欲知其详,请分阅下列各篇《纪事》。

纪事一 中央观象台从成立到撤销

民国元年(1912)春,南北议和,南京政府迁都北京。南京的教育部刚一北迁,就奉到国务院交办编制历书任务。教育总长(即部长)蔡元培在南京临时政府任职时,就认识临时政府内务部疆理司司长高鲁,知道他出身于清季福建马尾海军学堂,通晓实用天文,就派高鲁主持这项工作。同时教育部本身接管清政府的学部,旧学部所属编译图书局职员常福元出身于清季天津水师学堂,也通晓实用天文,就派他协助高鲁筹办这项工作。清政府的编历机构钦天监由教育部接收后被撤销,旧人员被遣散。教育部另成立一个新机构,命名为“中央观象台”,作为教育部的附属机关。教育部接收旧钦天监三座房屋,把其中的一座外署即泡子河观象台拨给中央观象台作为台址(参阅《纪事七》)。中央观象台组织条例规定,台内设历数、气象、天文、磁力(即地磁)四科。当时中国摹仿资

本主义国家政体，设有两院制的国会，这个组织条例曾经参众两院讨论通过。成立之初，由于人才、设备、经费都不充足，暂时先成立历数一科，以应付赶编历书的任务。由教育部呈国务院转总统，荐任高鲁、常福元为技正，高兼台长，常兼历数科长。由教育部直接委任历数科技士五人；行政部门分管文牍、会计、庶务主事各一人。另由台长直接任用历数科办事员数人（其中三人分任蒙文、藏文、回文翻译）；行政部门书记（即缮写员）数人。合计职员总数还不满二十人。这就是中央观象台初成立时的面貌。次年（1913）成立气象科，增加职员约近十人。1915年因出版《观象丛报》，设立编辑室，增加编辑数人。大约在1920年（？），教育部派高鲁赴巴黎，任驻欧留学生监督，由常福元代理台长。1921年冬，天文科和磁力科宣告成立，总算在形式上完成十年前国会通过的中央观象台编制。但这时候北洋军阀政府财政十分拮据，职员薪水已积欠数月，不适宜扩大编制，这两科每科只添用职员二人，连同科长每科只有三人。科长未从台外增聘，由常福元兼任天文科科长，调编辑室编辑王应伟为磁力科科长。1922年高鲁回国，复任台长。常福元交卸代理台长职后，专任新成立的天文科科长，他原兼任的历数科科长，聘北京大学数学系讲师叶志代理。不久，叶志赴德国留学，由历数科首席技士王世镠升任科长。这几年由于北洋军阀政府财政一天比一天困难，职员欠薪愈积愈多，有办法的纷纷到外单位兼职，常常出现清早来台画一个“到”就离开现象。连台长高鲁、气象科科长蒋丙然都在北京大学兼课，当然不能禁阻别人。气象科一名职员谋到湖北某县县知事（相当县长）职位，他带走台内同事二人上任。在任不满一年便被免职，他本人不再回台，他带走的那两人回到北京，仍到观象台任职。有些青年谋不到兼职，便投考大

学兼读。例如我，就考入北京大学；天文科的吕瀛考入私立中国大学。还有天文科的宋国模已是北高师毕业班学生，他毕业时正值教育部把北京、南京、武汉、成都四所高师升格为大学，学校对他们毕业班宣布，如果愿意续读一年，便可取得新成立的北师大毕业证书，他便续读一年。每天在天文科观测太阳一次，其余时间都到北师大听课，晚间回台测星。如遇天阴，整天在北师大。总之，那几年由于欠薪，职员上班很不正常，缺勤率很大。1926年7月，由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师北伐，节节胜利，半年时间占有长江以南各省，高鲁辞职，南下投奔他的老上司蔡元培，由常福元继任台长。

1928年南京政府的所谓“国民革命军”再度出师北伐，是年夏季进入北京，北洋军阀政府灭亡。南京政府改北京地名为北平，並命令所属各部派员赴北平分别接收和各该部相当的北洋军阀政府各部包括附属机关。中央观象台隶属北京教育部，而南京教育部下面没有和它相当的机关，便由国民政府命令它直辖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转令所属天文、气象两研究所派员会同接收。天文所由当时的代理所长高平子亲自出马，气象所所长竺可桢派职员黄厦千为接收员，高黄二人结伴北上。他们到北平后，秉承上级意旨，撤销了中央观象台这个机构，另在原台址成立两个新机构，一个是“国立天文陈列馆”，另一个是“北平气象测候所”。名为两个机构，实际是两块招牌，一套人马。留用旧职员二人，工友二人，合计四人，共同管理这个摊子，中央观象台寿命到此终止（详见《纪事七》）。

纪事二 南北两个测量系统的蝉联

清朝末年，模仿西洋，创立新式陆军，在中央设立军谘府（相

当于外国的参谋本部)，军谘府下面设有陆军测量总局和京师测绘学堂；有一部份省也设立有本省的陆军测量局和陆军测量学堂。民国成立，新政府接管清政府的军谘府，改组为参谋本部。参谋本部接管陆军测量总局和京师测绘学堂，接管后局名不变，“学堂”的名称改为陆军测量学校。测量局和测量学校都分设三角、地形、制图三科。测量局是测绘事业的业务机构，测量学校是培养测绘人才的教育机构。测量局三角科的具体业务是测量三角点，包括控制大三角点的天文点，因此，测量学校三角科以“实用天文”作为主课。测量学校先办“寻常科”，寻常科毕业后升入“高等科”，高等科只办了两期，毕业生合计不过一百人有奇，其中一部份人成为中国近代搞实用天文的骨干，并成为培养下一代接班人的种子。

一十年代后期，北洋军阀政府财政十分困难，欠发各机关职员薪金很多。各部欠薪多寡不同，有的部如交通部自身有财源，欠薪很少。参谋本部自己没有财源，它直辖于总统府，不隶属国务院，财政部对它不买帐，因此欠薪最早，积欠最多。当时报载参谋本部有一职员拉人力车维持生计，是真事。不但测量学校停止招生；连测量局也因职工欠薪，加上野外工作费无着，业务停顿，机关瘫痪。

1927年冬（或1928年春？），南京的国民政府也设立起参谋本部。这个部一成立，马上接管原隸北洋军阀政府的江苏省陆军测量局，改组为陆地测量总局。除留用原江苏省陆军测量局旧业务人员外，原北京测校高等科一二两期毕业生中一部份人也来南京归队。例如原北京测校高等科第二期毕业生曹谔在南京归队后任三角科科长，李原任三角科股长。原北京第一期毕业生花春培本是旧江苏省陆军测量局局长，改组成立新总局后，先留用任总局三角科科长，

后来升任总局副局长。此外还有原浙江省测量局培养的搞实用天文的沈文侯、楼敬烈等也来到南京总局三角科。这个陆地测量总局后来也办起陆地测量学校，担任天文课的主要教官是原北京测校高等科第二期毕业生刘述文。这个学校培养出来搞实用天文的人才，不论从数量上说，或从质量上说，都超过北京时代。从数量上说，北京只办了两期，南京（包括抗战时撤退到贵州镇宁）办了许多期。从质量上说，北洋军阀政府财政困难，学生毕业刚刚开展工作不久，便遭遇袁世凯称帝，中国、交通两银行钞票停止兑现，币值贬低。紧接着就是欠薪，机构瘫痪，人员星散。而南京的参谋本部在抗战前十年间经费比较充裕，南京的总局在这十年间随时增添新设备，订阅国外期刊，这就有助于业务人员水平提高。后来还曾资送少数人员到国外进修。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胜于前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椎轮为大辂之始”，如实反映历史真象，应该说中国近代实用天文事业滥觞于北京时代。按1927——1928年，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的国民政府是敌对的，双方在长江以北随时进行拉锯战，北京政府旧人员投靠南京政府还自认为是“弃暗投明”（当时还不懂得南京政府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也属于反动政府这层道理），思想上对北京政府敌对，但对留在北京的旧同事并无反感，不论中央观象台南下投奔天文研究所人员对中央观象台人员，或南京陆地测量总局人员对北京陆军测量总局人员都是如此。在测量事业，南北两个系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一批原北京测校毕业生来到南京后，起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因此，我把本文标题写为《南北两个测量系统的蝉联》。

1937年七七抗战军兴后，陆地测量总局撤退到贵州省，总局撤到贵阳市，测量学校撤到镇宁县，这时候测量总局的上级机构不再